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

叶 铭

内容提要 战时国民党军事教育为抗战中的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参谋教育因其专业性,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认为军令系统是军队大脑,参谋教育无异于为大脑提供脑细胞。军令部主管战时参谋业务,兼及参谋教育。在军令部主持下,形成了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特训班为主轴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体系规范的建立、参谋教育部门的监管、毕业人员管理以及战时战术思想统一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从而为各级参谋部门培养了大量人才。当然,军令部战时参谋教育也存在自身的缺憾。战时参谋教育可谓战时军事教育的缩影,能够展示烽火年代军事人才培养的点滴侧影,体现中国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关键词 军令部 抗战时期 军事教育 参谋教育

战时军事教育中的参谋教育与普通军事教育有所不同,所谓参谋是“必须国内外陆海空军大学,及陆海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学能优秀,思想纯正,体力健壮”^①的军事人员,参谋部被称为“军队大脑”,参谋人员自然就是脑细胞,是具有特别军事技能的专业人才。战时参谋教育方面,陆军大学(以下为行文方便或简称“陆大”)为参谋养成教育,其附设的参谋补习班、参谋特训班,以及部队自行进行训练的参谋研究班与幕僚班则可归为召集教育。^②因此,经过军令部努力,战时参谋教育机构逐步形成完整的参谋教育体系。涉及战时参谋教育方面研究的论文专著较少,目前只有台湾的张瑞德在其论著《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以及论文《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③有所涉及。不过《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关乎人事制度居多,《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一文也并未以参谋教育为主展开讨论,因此,缺乏针对战时国民党军参谋教育的深入探讨。《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主要分析了战时主要参谋教育机构陆军大学的师资与课程设置,但是并未涉及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其他层面,也未

① 参谋本部:《整理参谋人事暂行办法》(1937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02。

② 所谓养成教育,就是养成特定军事人才素质的教育形式;召集教育,一般为临时性,为达成特定教育目的组织人员进行教育的形式。两者对比,一为正规教育形式,一为临时教育形式。

③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张瑞德:《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台北,1993年9月。

讨论军令部与参谋教育机构的关系,不免存在缺憾。根据相关资料,军令部为战时参谋教育主管机关,在其领导下,国民党军战时的参谋教育机构初步形成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与参谋特训班、参谋幕僚班三个层次,分别培养高级、中低级与基层参谋人才,已然具有比较完整的参谋教育体系框架。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分析并讨论战时参谋教育体系框架、军令部与战时参谋教育之间的关系、战时参谋教育的特点与作用,同时针对国民党军战时参谋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战时参谋教育体系

(一) 陆军大学:高级参谋人才摇篮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军事最高学府,其创办目的在于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战时曾担任过军令部处长的许朗轩认为:“按照当时军事教育体系,陆军方面,概分养成教育、进修教育及深造教育三个层级。养成教育方面:分为黄埔陆军军官校及各省讲武堂;进修教育方面:分为步、骑、炮、工等兵科学校以及兼具养成教育性质之通信、交辎、防空、机械化等学校;至于深造教育方面:则只有陆军大学。由于其规模、师资、教学内容、实施方式,皆属国内第一流的军事教育学府,而学员毕业后可获得重用。”^①就陆军大学设置意义而言,战时担任四年陆大教育长的万耀煌认为“参谋本部研究国防计划,陆军大学则是从事国防教育,二者都是为了建立参谋系统”,在参谋人才培养效果上,他认为“其军事理论与计划都自成一个体系,尤注重战争理论、战史、指挥参谋修养的陶冶,以养成军官优秀的人格、学识、与道德”。^②陆大的前身是1906年5月创设于保定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该学堂的目的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和参谋人员,“隶属于北洋军学督办,段祺瑞兼任该学堂督办”。^③“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设立参谋本部,将学堂由保定迁至北京,隶属于参谋本部,由部令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④陆大第十期(1932年)时,“学校迁到南京后,决定每年招收正则班(即正期生)学员一期,续办特别班,增设兵学研究院;并临时召集部分在职军官来校进行短期补习教育”^⑤,此时“学生已以黄埔生为主干,蒋委员长自兼校长,并对参谋本部加以整顿,至此陆大学生才因黄埔系而有出路,可以说由于黄埔生之加入,始给陆大带来了生气”。^⑥

陆军大学招收正则班、特别班与将官班,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将官班并非陆军大学常设班次。抗战爆发后,“军令部为作战指导中心,参谋总长何应钦外,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林蔚以下,全属陆大毕业,为指挥统一计,各战区司令长官自然乐于任用陆大学生,因此大为各方所见重,在校学生未及毕业,已为各军预订一空,陈诚曾笑说:‘陆大学生求过于供,好像商场一样,行情看涨了。’实际上作战需要好的参谋干部,所以陆大学生才为各方竞相罗致,形成供不应求,当时上尉入校,毕业后即可升上校,其盛况可见一斑”。^⑦斯时“正赶上前方部队急需参谋人员,向陆大要人。学校当局决定第十三期、第十四期提前4个月先后于1937年12月、1938年7月毕业”。^⑧其后,陆军大学每年

① 许承玺:《帷幄长才许朗轩》,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7—38页。

② 郭廷以校阅,沈云龙访问,贾廷诗等记录:《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390页。

③ 阮绍文、王启明、管长治:《陆军大学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④ 阮绍文、王启明、管长治:《陆军大学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58页。

⑤ 阮绍文、王启明、管长治:《陆军大学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59页。

⑥ 《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395页。

⑦ 《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395页。

⑧ 卢凤阁:《陆军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回忆》,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162页。

招收一期学员。抗战时期,陆大正则班招收第十四至第二十期共七期学员,总数为 807 人。特别班特三至特七期共五期学员,总数为 665 人。将官乙级班一期 120 人,将官甲级班三期共 132 人。^①抗战期间陆大各种班级共毕业学员 1724 人。

战时陆军大学主要培养中、高级参谋人才,罗友伦在接受访谈时说“因为部队中参谋最缺乏,而陆军大学就是专学作战、指挥训练,军中非常需要这种人才,所以陆大毕业生有很多都担任了高级参谋的职务”,这表明陆军大学培养多为中高级参谋人才。^②陆军大学课程设置上力求理论和实践并重,要求学员既熟悉参谋业务理论,又通晓参谋业务实际。但从实际效果看,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仍不免重理论而轻实践。^③丁治磐曾评价“陆大学生多半是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轻人,只知纸上谈兵的计划作业”。^④虽然抗战时期陆军大学教育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其为国民党军培养了很多中、高级参谋人才,使国民党军参谋业务逐渐走向正轨。

(二) 参谋补习班、特训班:中、低级参谋人才基地^⑤

参谋补习班与特训班是培训中、低级参谋人才的基地,是陆军大学的重要补充。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其报告曾经明白阐述两班成立的原因:“为补充低级参谋起见,于陆大正则班及特别班外,并增设特训班,召集由军校新近毕业的优秀学生施以短期参谋教育,以应需要。又因各部队现任参谋人员素质不齐,参谋业务推行困难,故军令部在对参谋教育以外,并设立参谋补习班,召集现任参谋人员施以补习教育,充实其学力。”^⑥作为当事人的参谋补习班第三期学员马毅在其回忆中认为,成立参谋补习班和特训班的原因在于“抗战时期,一是新建不少新部队,急需幕僚;二是作战期间幕僚或调任队职或伤亡急需补充;三是急需提高幕僚素质以适应作战需要”。^⑦

由于参谋补习班和特训班隶属陆军大学管辖,陆大教育长万耀煌对设置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他回忆陆大参谋补习班的学员均是各部队现职参谋,由于召集补习时间比较短,加之交通不便,因此受训者觉得参加受训困难重重,在办完前三期后,从第四期起变更开办办法,具体而言就是在桂林与西安两行营所在地分办。就近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这样在时间上经济上都方便,仍由陆军大学负责计划和教材准备,能够起到两班统一教学的目的。桂林的西南参谋补习班,以陆大中将兵学教官、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何成璞为主任;西安的西北参谋补习班,以陆大中将待遇兵学教官金典戎为主任。西南、西北参谋补习班教学详细计划由两主任与陆大教务处会商。^⑧陆大第十五期学员杨正民在回忆文章中谈及:1936 年招收参谋补习班第一期学员,名额为 100 名,一年毕业,由各军、师保送优秀参谋入学受训,不用考试。以后同正则班、特别班一样,每年招收一期入学受训。必修

① 参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4 年版,第 36—39 页。

② 参见朱浚源、张瑞德访问,蔡说丽记录《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版,第 27 页。

③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台北,1993 年 9 月,第 14 页。

④ 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记录:《丁治磐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版,第 80 页。

⑤ 因为档案资料匮乏,本段主要讨论参谋补习班的情况,兼及参谋特训班概况。

⑥ 《在军委会国父纪念周工作报告》(1942 年 3 月 2 日),陈存恭、赵正楷合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年版,第 242 页。

⑦ 马毅:《陆大参谋班回顾》,《卫我中华——黄埔校友抗日回忆录》,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2005 年编印,第 115 页。

⑧ 万耀煌:《我主持陆军大学的回忆》,《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 195 页;另参见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 278 页;西南参谋补习班主任后为陆权。

课程,如战史讲授等,与初进校的正则班合班听课,战术作业则分别进行。^①抗战爆发后则是直接从中央军校和分校毕业生中择优选拔,直接入校培训,学制改为半年。^②1944年西南参补班因战事影响,向独山移动^③,随着战事吃紧,西南参谋补习班甚至有停办打算^④,最终只是暂时停课。具体实施过程中,西南参谋补习班负责召集江南第三、四、六、七、九战区参谋人员;西北参谋补习班负责召集江北第一、二、五、八和冀察、苏鲁战区的参谋人员进行参谋教育。^⑤西南、西北两班的编制及课程完全一样,只是各有自己的负责人而已。

参谋补习班分为学员队和学生队两部分,学员队招收各部队报送在铨叙厅任职有案的参谋人员,学生队由军令部掌握,在中央军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⑥作为中低级参谋人才培养机构,参谋补习班和特训班战时培养了一部分基层参谋。由于档案及回忆资料中失载,缺乏参谋补习班与特训班毕业学员总数的资料,当事人回忆认为西南和西北参谋补习班“每期招收学员100人,训练时间为半年”^⑦,《第三次部队参谋视察关于参谋人事之参考材料》曾有“陆大参谋补习班,八期:九二二”^⑧,也就是西南、西北参谋补习班此前共训练八期参谋人员922人。1942年年度报告中记载“陆大参补班第八期毕业350人(西南班166人,西北班184人),第九期西南班指名召集234人,入学212人,西北班指名召集180人,入学171人,第十期西南班召集480人,西北班召集480人”。^⑨以此推论,抗战结束时参谋补习班训练参谋至少在3000人以上。至于参谋特训班的培训人数方面更缺乏直接资料佐证,档案资料中记载“陆大参补班西北班特训三期,共有86人,均为尉官,其中上尉3人,中尉35人,少尉48人”^⑩,1942年“参补班特训第四期毕业195人,西南班87人,西北班108人”^⑪,由此大致推算抗战时期参谋特训班所培训的低级参谋人数接近2000人。

参谋补习班学习课程与陆军大学正则班大体相似,参谋补习班所教课程包括“参谋业务、战术学、筑城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卫生学、战史、测绘等”。^⑫在关键的战术和参谋业务教学方面,“内容是针对日本侵略军的战略战术,进行图上作业。如兵团的会战,军、师的攻防战术:研究敌情,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在决心的基础上草拟作战计划;根据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写阵中日记、

① 杨正民:《回忆陆军大学十五期》,《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112页;关于参谋补习班开设时间说法不一,万耀煌认为是抗战爆发后,杨正民认为是1936年,张瑞德认为是1935年,张瑞德的观点来源是1935年参谋本部公布《军队参谋教育大纲及计划》的规定。我认为参谋补习班是1936年开设的,一则杨正民1936年考入陆大第十五期,与参谋补习班同时开课,记忆应当不错,张瑞德以文件为依据,本无不妥,不过考虑到从形成文件到具体实施的过程,1936年说更易接受。万耀煌所说的抗战爆发后,当指陆军大学附属西南、西北参谋补习班。

②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40页;《关于陆大参谋补习班及特训班之教育期限与教育方针》(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83。

③ 《军令部第七十六次部务会报纪录》(1944年10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8。

④ 《军令部第八十一次部务会报纪录》中有“西南参补班停办一案,奉批拟具停办后西南各部队参谋召集办法”一语,参见《军令部第八十一次部务会报纪录》(1944年11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8。

⑤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40页。

⑥ 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78页;张瑞德指出参谋特训班“指调由军官学校毕业而见习期满的优秀军官,施以训练”(参见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第748页),与上述学生队情况类似,由于档案中缺乏特训班确切资料,因此,笔者推测这里所谓的学生队很可能指的是参谋特训班。

⑦ 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78页。

⑧ 《第三次部队参谋视察关于参谋人事之参考材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1。

⑨ 《军令部1942年10月至1943年10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81。

⑩ 《陆大参补班学员分发志愿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600。

⑪ 《军令部1942年10月至1943年10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81。

⑫ 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79页;《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实施办法》(1943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83。

战斗要报、战斗详报等作战文书写作法等”^①，“学习过程的最后一个月，多半是各种实习”。^②以西南参谋补习班为例，学员的实习指的是在各门参谋业务学完之后，举行高等司令部演习。学员分为南、北两军司令部的演习人员，分别担任演习指挥官、参谋长、处长、科长和参谋等，在兵学教官的统裁下，在地形图上对抗指挥演习作战，连续五六昼夜，全面考核学员所学战术和参谋业务的运用能力。^③

（三）其他参谋教育机构

除陆军大学及参谋补习班、特训班外，战时国民政府于1943年成立国防研究院，该院“选拔全国海陆空勤优秀青年军官有学识基础者三十至四十名来院一年，以国父‘国防十年计划’为研究中心课题，与高级班配合，养成文武合一的干部”，“每一课门，有讲述、有检讨，尤重研究写作，结业后，全部分发至国外我驻在各国武官处或盟军总部任连〔联〕络员继续研究，以资磨炼”。^④国防研究院是国民政府为培养高等级参谋人才设置的机构，类似美国的战争学院。不过第一期毕业后，“因美军方致送备忘录，不同意在战争紧张期间将优秀干部调至后方，因而未能继续办理”^⑤，因此，实际效果不大。

此外，军令部开办了专门型参谋培训机构，以情报参谋训练班为例，其开设目的在于“为谋各战区部队情报业务之发展及联络确实”，训练班为期两周，每期“一百人，暂定由各战区各军师就现任情报参谋中选派”。^⑥然而，根据军令部1942年10月至1943年10月的工作报告记载“谍报参谋班第六期46人”^⑦可知，情报参谋训练班并非每期保证100人满额，且到1942年情报参谋训练班已经开办五期，仍出现缺额情形，此前状况可想而知。

军令部还令各部队开设各种参谋培训班加强巩固参谋业务，“1939年令各军办幕僚班。至1943年，为简化易行起见，复订幕僚常年教育办法，于各战区设参谋研究班，每期三个月；于各集团军设参谋短期训练班，每期一个月；于各军设幕僚班，不重形式”。^⑧从战区到集团军到军都有参谋培训班存在，这样，在参谋养成教育外，各部自行开设的参谋召集教育也能自成系统。

总体而言，战时参谋教育机构业已初步形成高、中、低三级体系，与此同时，实施方面按参谋业务进行分班教育，大体上能够满足战时国民党军不同级别、不同专业参谋人才培养的需求。这套体系在高、中级参谋人才的培养方面尚有保障，低级参谋人才培训则有些力不从心。简言之，战时参谋教育机构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参谋人才，为抗战中国国民党军的指挥提供了新鲜血液。

二、战时军令部参谋教育措施

陆军大学与参谋补习班并非抗战时期新设参谋教育机构，参谋教育亦非战时独有，军令部究竟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参谋教育统合，从而形成参谋教育体系，体现其建立参谋系统价值？大致有这样几点：其一是重视参谋教育，关注教育机构负责人选；其二是改革参谋教育课程，适应抗战要求；其

① 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83页。

② 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80页。

③ 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84页。

④ 王东原：《浮生简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创办原因为“委座手令，拟亲自训练能指挥陆海军协同作战之参谋，此即高等兵学研究机关，亦即国防研究院，研究陆海空军之学识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偏重于实施办法之研究”，参见《学术研究会第十四次会议纪录》（1942年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⑤ 王东原：《浮生简述》，第68页。

⑥ 《军令部情报参谋训练班组织条例》（1943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391。

⑦ 《军令部1942年10月至1943年10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81。

⑧ 《统制各集团军参谋教育班次办法》（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3。

三是利用参谋视察,考察参谋教育实施;最后是掌控参谋人事,统制参谋教育培养的人才。

首先,军令部自成立后即十分重视各参谋教育机构的情况,同时加强对这些参谋教育机构的监督与领导。抗战军兴,军令部成为军事委员会中重要部门,其职权就包含军令部长“统辖……陆军大学”。^①为了解决战前参谋本部对陆军大学掌管不力的问题,军令部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从实施上看,军令部牢固把握参谋教育机构的监督与领导。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非常注意陆军大学负责人的选用,陆军大学自蒋百里突然逝世后,经历一段周亚卫代理时期,后来启用万耀煌出任教育长。“万治校甚严,曾因有人不守课堂纪律而被开除,在陆大历史上是没有的”^②,但徐永昌评价万耀煌对于军事只是门外汉而已,尽管做事认真,但抓不住重点,还不能识人^③,陆大学员则认为万耀煌“学术上的声望远不及杨杰、蒋百里诸人”。^④所以,在阮肇昌担任很短时间的陆大教育长后,杨杰自1931年12月初掌陆大之后得以再掌陆大。徐永昌多年之后回忆,“我对于本校的经过情形,十余年来一直注意着,由我在军令部时起,本校实际负责的,完全是教育长,二十六年末似是杨耿光(杨杰——引者注,下同)之后是周普文(周亚卫)而万武樵(万耀煌)而阮肇文以迄徐培根四五位。当时因为时值抗战,环境艰难,又在动乱期间,管理松懈,因此屡屡发生超出范围事故。其实万教育长时期,他真尽了很大努力,为了学员每每不服从校规,而至于一再开除学籍等等,他不顾情面的断然往下做,这是他无畏精神的表现,也是他负责任的表现……至于阮教育长,当任命时,委员长就说他学问好,可惜做事软一点。徐教育长在校八年,孜孜学问,天天努力,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以上几位教育长,最负责的要推万和徐,至于周和阮,非是他们不負責,而是注意力不够,以致影响到他们应负的责任。”^⑤结合战时徐永昌日记中记载的内容,时隔17年后,徐永昌对于历任陆大负责人特点依然如数家珍,他对这些将领可谓了如指掌,必然根据他们特点使用,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军令部以及徐永昌对陆大负责人的重视。

军令部在其日常工作中也非常关注陆军大学及其他参谋教育机构的情况。战时国民政府各军事机构部门日常运作以会报为主,军事委员会各部、会、室相继采用会报的方式开展日常工作,军令部的部务会报也不例外。其目的在于“谋业务之联系与进展,暨办理敏捷促进工作效率”。^⑥按照时间顺序,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军令部会报中就有相当部分涉及陆大以及参谋教育问题。1938年有“整顿陆大之研究”^⑦、“责成陆大负责者整顿校务”^⑧,报考国外陆大或参谋学校资格问题,陆大不合格教官上报军令部问题等内容^⑨;1939年讨论“对参训班教育问题”^⑩;1941年则有“一、陆大及参补班之训育管理;二、参补班考察不能胜任参谋者取消参谋资格,随时另调他职;三、陆大学员品行、战术成绩规定分数不足时,随时退学,研究班学员品能亦应规定标准办法”。^⑪1942

①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组织法》(1939年12月8日),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军事委员会》(1),台北,“国史馆”1996年版,第299页。

②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35页。

③ 《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6册,1941年10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以下简称《徐永昌日记》)。

④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35页。

⑤ 《纪念校庆应有的认识——陆军大学四十五周年校庆训词》(1951年5月12日),陈存恭、赵正楷合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44页。

⑥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务会议规则》(1938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96。

⑦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5月18日。

⑧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8月17日,起因在于陆大第十五期、特三期生请愿。

⑨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5月30日。

⑩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7月25日。

⑪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3月11日。

年曾经关注“参补班之指名召集与特训班之改进”^①,及是否对陆大研究院加以改进”^②等问题。战争后期军令部在1943年的会报中依然强调陆大学员、课程和参谋补习班问题^③,陆大具体教学问题^④,以及要求军令部第三厅关注陆大教官和教学等。^⑤可以说,军令部每年的工作重点都包含监督与指导各参谋教育机构的内容,这种监督与领导是军令部强化各参谋教育机构的有力措施之一。

其次,军令部推动陆军大学教育方式改革,以期加强参谋教育,提升参谋教育质量。战时在军令部指导下,陆军大学教育方式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改革传统教学方式,陆大教学方式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第十七期起,陆大开始进行兵科战术教学,同时学员分发到部队或各兵科专门学校中去作兵科实习。每一个教官只专门负责担任一科的教学,不兼任课程。每一战术课目,有课后作业,共达1200小时,三年之中,几乎每日都有战术课程,陆大认为学员受此磨炼,毕业之后,作战当毫无问题^⑥,并认为能够达到奠定学员学习诸兵种联合作战战术即大兵团战术和大军战术的良好基础。^⑦

其二,改革具体战术课程内容,即将战术课程与抗战实际联系起来。原本陆大战术教材大多讲述西方一战之前的战术,不能适应抗战实际需求。万耀煌认为“在战术思想中,西方没有遭遇战的观念,但在抗战期中却常发生遭遇战。遭遇战有预期的,有非预期的,都包括攻防追退在内,于是我(万耀煌)又命令各司专科的教官,以一共同假想敌为目标,集中商讨教学、宿题、考试等问题,如此在教育方法上也能彼此联系,步调一致”。^⑧

其三,军令部要求陆军大学开展教学时特别注意教学方法。军令部认为陆大的教学方法应该以课堂讲授和现地作业为主。就课堂讲授而言,战术课为其重点。为了便于教官与学员或者学员相互之间充分研究讨论,通常每班分为十余人的若干个小班,进行教学。其余各课都在大讲堂进行全班集体讲授。现地作业应当在战略要地和重要作战线实施,目的是便于研究出较为合理的方案,供军令部拟制国防计划和国防设施时参考;同时教官、学员熟悉地形,以利于将来到该地区执行作战的任务。^⑨现地作业主要是指现地战术、司令部勤务演习和参谋旅行。所谓现地战术,是由教官先在地图上研究,确定好拟定的地形地貌,然后到现地侦察并拟定各种情况的“想定”,再率领学员到现地发下“想定”,学员根据“想定”侦察地形在现地作业,然后由教官讲评并发下“原案”。^⑩司令部勤务演习是对司令部各项勤务的演练,即分为东西或南北两军,双方各设司令部各种职务的人员及团长,并备有地图、沙盘、兵棋、电话等。由指导教官对双方下达“想定”,双方人员根据自己担任的职务照“想定”的情况各自进行工作,然后指导教官由下或由上对双方不断传达新的情况,双方再根据各阶段的新情况进行推演,最后由指导教官综合双方情况进行讲评。参谋旅行是军战术、参谋业务、谍报业务、输送业务、兵站业务等在现地的一次综合作业,内容既广泛,使用的地域也较大,指导方法与司令部勤务演习概略相同,惟对方情况系假设,各项作业不是分工而是每人都做,可

①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12日。

②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5月16日。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6月29日。

④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11月27日。

⑤ 《军令部第二十八次部务会报纪录》(1944年4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7。

⑥ 《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401—402页。

⑦ 邓锡洗:《陆军大学第十八期的片断记忆》,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188页。

⑧ 《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第402页。

⑨ 阮绍文、王启明、管长治:《陆军大学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69页。

⑩ “原案”就是教官所拟定的参考答案。

以说是经过两年学习后的一次综合检查。^①这些都是陆军大学在课程方面的重要改革与转变,如此能使学员在学习中树立明确、统一的战术思想,熟悉参谋业务,对于他们参谋业务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从而最终达到提升参谋教育质量的目的。

第三,利用参谋视察,考察各部参谋教育实施。军令部对各级参谋机构定期考核就是进行参谋视察,这一举措与参谋教育相关的是:“考查各部幕僚教育情形(特应注意是否按部颁教育计划实施及重视机会教育否)。”就参谋视察目的而言,有三条与参谋教育有关,包括各部参谋人事教育业务之考查与指导;征询各部主官及参谋人员对参谋人事业务教育之意见;对各部中下级参谋人员予以机会教育。^②参谋视察人员到各部队后,具体实施程序上,包括进行档案检验、业务报告、个别谈话、笔试测验、座谈会^③等,从理论到实践对各部队参谋教育实施进行考察,以便掌握相关情况,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最后,军令部掌握参谋教育人才分配,以期统制参谋人事。战前国民党军各教育机构培训出来的参谋人员存在相当问题,张瑞德研究认为由于经过专业训练的参谋人才稀缺,军令部无法满足各部队在参谋人才方面的需求,所以各部队主官多半自行搜罗参谋人才,即使经过军令部核委这一程序,军令部也无法真正做到人事统制。也就是说,参谋人事权名义上在军令部,但实际上参谋人员却成为部队主官的私人助手,参谋人员更倾向于听命部队主官而不是按照参谋系统听从军令部命令^④,由于存在这种情形,战时参谋业务开展必然困难重重。延伸到陆军大学学员毕业分配问题上,他们多半是按学缘、业缘、地缘,即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标准处理毕业学员人事,军令部不能真正实现对毕业学员进行统筹安排的原定目标。^⑤有鉴于此,军令部认为既然陆大为其管辖部门,就必须像德国那样,军队指挥权在参谋部(也就是战时中国的军令部),陆大学员分配权相应的也应该在军令部。^⑥军令部解决的办法就是学习德国参谋系统,成立参谋团。德国总参谋部的做法是:陆大每期学员中选择20%人员,经过严格筛选,留下4%—5%的最优秀参谋人才在战时统帅部作为候选人才,战事爆发后随时派遣到各部队做参谋长,军令部决定参考这种做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以陆大毕业学员为主,辅以参谋补习班毕业人员组织国民党军的参谋团,从而由军令部牵头建立国民党军自己的参谋系统。^⑦为此,军令部“颁布《国民党军参谋团组织纲要》、《国民党军参谋团实施细则》、《国民党军最优参谋军官资格审查委员会组织暂行办法及各项表式》,调查联络陆大毕业学员并登记”^⑧,通过建立国民党军参谋团这一方法以真正实现统制陆军大学及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学员人事分配权。万耀煌做出的措施则是从陆大第十七期开始,所有考取陆大的学员人事关系转入军令部,以军令部附员身份在陆大学习,学习期间薪饷、服装、补给均由军令部负责,不许与其他军事机构发生关系,不得兼职,这样毕业之后军令部能够统一分配。^⑨以上这些举措,能够保障军令部对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学员的分发与服役状况进行有效掌控,从源头上对参谋教育人才进行实际统制。

① 刘学超:《我所知道的陆大特四期一些情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42页。

② 《军令部第三次视察部队参谋计划及实施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0。

③ 《军令部第三次视察参谋第一组总报告书》(1943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9。

④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第757页。

⑤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第758页。

⑥ 邓锡沅:《陆军大学第十八期的片断记忆》,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178页。

⑦ 《军令部关于创立参谋团的工作报告》(1942年10月—1943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81。

⑧ 《军令部关于创立参谋团的工作报告》(1942年10月—1943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481。

⑨ 《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年版,第215—216页,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第759页。

军令部为了实现建立参谋系统的目的,将目光投射在参谋教育方面,因为参谋教育培养的人才军队大脑—参谋系统的脑细胞。军令部能否真正建立系统,树立自身在参谋业务方面的权威,没有这些“脑细胞”其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军令部在参谋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不但为形成参谋教育体系提供保障,同时也是军令部自身建设的过程。因此,考察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体系方面的成效,是评估军令部参谋教育措施的不二标准。

三、战时参谋教育体系成效

抗战时期急需大量军事人才,参谋人才作为一种特殊军事人才格外缺乏。战时军令部采取相当措施以形成自身的参谋教育体系并进行改革。其主要成效体现在:规范参谋教育体系,加强对参谋教育机构的监管,改革参谋教育的方式,提升战略战术水平,通过参谋视察考核各部队参谋教育实施效果,统制参谋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等方面。在战时参谋教育方面,军令部具有自身特点并发挥一定作用。

首先,军令部完成了参谋教育机构体系的规范化。军事参谋学认为参谋人才的培育包括“对参谋人才的培养、教育、训练、提高,不断积累知识,增长才干。要培养成批的高质量的参谋人才,必须建立一个正规的参谋人才教育训练体系。这个体系应有紧密衔接的这样三个环节:一是院校教育,学知识,打基础。二是部队实践,用知识,长才干。三是在职训练,更新知识,不断提高”。^①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大体与之符合。军令部的参谋教育机构包括正规的院校教育(召集教育)与部队自行训练教育机构。在召集教育机构方面,则包括陆军大学与参谋补习班两个部分,分别培养中高级参谋人才与中低级参谋人才。抗战前参谋教育的正规院校局限于陆军大学一所,以第十一期毕业学员任职为例,有的留校进入教官研究班,大部分出任军、师的参谋长和参谋处长^②,都以中、高级参谋职务分发(即分配派遣)。当时军队急需的中、低级参谋人才,则没有成立正式的教育机构。直到1936年,方在陆军大学中开设参谋班,但训练目的仅为“召集部队现职参谋人员予以培训,提高参谋业务能力,使能胜任师、军参谋长之职”^③,造成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中上尉与少校级参谋缺员分别为五分之一与四分之一。^④部队实践与在职培训,也只体现在法规之中,缺少实际行动。抗战爆发后军令部先后开办了参谋补习班、特训班、情报参谋训练班、参谋研究班、幕僚班等教育机构。以这些教育机构各自承担的不同任务以及各自的不同功能而言,陆军大学与参谋补习班属于院校教育范畴,前者主要负责培养、培训中高级参谋人才,后者则培训中低级参谋人员。参谋研究班、幕僚班属于部队自行训练范畴,都是部队参谋在职教育的一种形式。情报参谋训练班属于专业参谋培训机构,负责培训情报、谍报方面具备专门技能的参谋人才。在部队实践方面,参谋教育机构也有所措施。^⑤例如陆军大学战术课中就有见学(见习学习)一项,见学的学员到作战部队后“课程有步兵班、排、连的制式教练和战术教练、战术演习及步兵营的战术演习。另外还有步兵各种兵器、器材的技术和战术性能等”。^⑥通过以上措施,加强了陆大学员对基层部队一般情况的了解,使陆

① 祁长松、吴一非主编:《军事参谋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6页。

② 刘劲持:《陆军大学第十期内幕》,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141页。

③ 李鹤生:《我在陆大参谋班第二期受训情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75页。

④ 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数比较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309。

⑤ 部队自行训练部分,因参加培训的均为现职参谋人员,故而无须实践教育,进入参谋补习班培训的也为现职参谋人员,所以也无须实践教育,只有陆军大学学员,许多人在进入陆大之前并非服参谋役,所以实践教育比较重要。

⑥ 邓锡沅:《陆军大学第十八期的片断记忆》,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188页。

大学员避免出现“缺乏作战经验……只知纸上谈兵的计策作业”的现象。同时通过不同参谋教育机构的开办,军令部规范了参谋教育体制,丰富了参谋教育层次。

其次,参谋教育思想与方法能够适应战争要求,从而做到提升参谋的业务水平并统一战术思想。军令部认为陆大教育不单纯是参谋教育,还在于将才与能才的培养。因而,陆军大学课程设置侧重点在:1. 研究用兵问题,以师一般战术为中心;2. 建军问题,以军队建设为中心,授以兵役、军制、军队教育、交通设施、军需储备、军队整备、部队动员等军队建设相关课程。^①在这一理念下,陆军大学课程的内容以研究陆、海、空三军的战术、战略,古今中外的重要战史,大兵团指挥及实施演习等为主,后勤业务、兵器学及兵要地志为辅,另有外国语文、数学、经济学、政治学、中国近代史等。^②陆军大学战略战术教育纲领要求陆大日常学习内容着重在研究用兵原理,陆大学员应当具备各军兵种综合素质,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作战指挥,不单能够指挥小部队,也能指挥大部队,不单能够进行战术指挥,也能胜任战略指挥。^③

因此,在军令部指导下,陆大课程设置方面以战略、战术教育为陆大学员学习的核心。安排课程计划时,其原则是以战术课为中心,其他各课适当配合,按学年进度,循序渐进,逐步加深。^④陆大学员第一、第二学年有图上战术兵棋及战术实施的课程,第三学年有图上战术兵棋及参谋演习旅行的方式。^⑤战史教育主旨在于使学员体察用兵之奥妙,领略战争之实况。^⑥学员主要研修最近欧洲战史、日俄战史、普法战史、拿破仑战史。^⑦参谋要务则是以养成平战两时参谋勤务上所需之智能为目的,主要研究参谋业务、军政学、各国兵备、兵要地理、作战计划、动员计划(含国家总动员)、输送学、辎重勤务、兵站勤务、军队教育、演习计划、谍报及宣传^⑧,其中参谋业务主要为“拟制作战计划、作战命令、训练计划、训练命令等战斗、训练文书”。^⑨其他如军制学、兵器学等也是陆大学员必须学习的课程。^⑩

军令部提出“参谋人员须受统一的教育,养成统一的战术思想,战时始能上下贯彻发挥,统一指挥的效率”的要求。当时的学员认为“陆大各项课程中,最精彩的部分乃在于应用战术的磨炼,可谓是精益求精。战术教官对于《战斗纲要》一书的研究,均相当透彻,其淬炼的判断与构想的深入,令人不能不承认陆大此项传统教育方式,实为最大成就”^⑪,因此“陆大由于修业时间较长,学员经过密集的战术磨炼,才逐渐对军事战略和用兵作战有比较完整的概念”。^⑫各级参谋教育机构在战术方面使用同样教材,进行同样的战术作业,在战术教学方面也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强调火力压制和步炮协同,即考虑攻击时必须先以炮兵火力来施行压倒敌方的射击而后步炮如何协同,步兵又该如何利用火力以消灭敌人而后前进;二是把握战场态势,即考虑兵力的多少和战场态势的好坏与决

① 《学术研究会第十三次会议纪录》(194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②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台北,1993年9月,第9页。

③ 《陆军大学学校教育纲领》,《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234页。

④ 阮绍文、王启明、管长治:《陆军大学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69页。

⑤ 《陆军大学学校教育细则》,《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242页。

⑥ 《陆军大学学校教育纲领》,《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234页。

⑦ 《陆军大学学校教育细则》,《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244页。

⑧ 《陆军大学学校教育纲领》,《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234—235页。

⑨ 邓锡汤:《陆军大学第十八期的片断记忆》,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189页。

⑩ 《陆军大学学校教育细则》,《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242页。

⑪ 第十四期同学联合写作:《第十四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年版,第129页。

⑫ 沈云龙访问,贾廷诗等记录:《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台北,1993年9月,第13页。

定胜负的关联性,兵力多的就是胜利者,态势好的就是胜利者。^①除此之外,参谋教育机构还适时纠正学员的战术思想。如西北参谋补习班部分学员在入学之初还存在“以空间换时间”的看法,“教官们指出,现在不是抗战初期的方针了,所余的地盘已不多,还要拿空间去换时间,势必退到外国去吗?由此,大家才统一了认识”。^②正如徐永昌所言,“陆军大学校以礼聘用外籍教官,国别不一,故所教的战术、思想也极纷杂,用日本教官时则学日本战术;用德国教官时则学德国战术。现在我们抗战已有四年多,应依我们抗战的经验与环境,将国民党军的战术、思想予以统一,故陆大目前的教育常把‘统一战术思想’作唯一的目标”。^③徐永昌的训词可谓陆军大学在教育思想方法以及统一战术方面实施具体措施的最好注脚。

第三,运用参谋视察作为参谋教育考核方式,评估各部队中低级参谋召集教育成效。军令部认为,各级参谋机构毕业的学员,普遍掌握了基本参谋业务方法,提高了参谋业务水平。1941年第二次参谋视察时发现陆大毕业的参谋人员“一般学术尚优”,参谋补习班毕业的参谋人员“一般素质亦多优秀也”,“各级参谋毕业中央军校及出身其他正式军官学校者,各占十分之二。军学既具相当基础,故多能胜任。此外十分之六,系前川军所办之各种军事教育校队,湖南干部学校及中央各种短期军事教育班队毕业生。虽所受教育程度不齐,然一般均虚心好学,努力服务,且军学造诣,较之部队官长仍多居优秀,而此班人员咸盼多受参补教育,实亦提高参谋素质,补救目前参谋人才缺乏之要道。是乃本部亟应统筹施教之急务者也”。^④通过参谋视察报告,军令部明了各部队在参谋教育方面的需求,从而在参谋教育实施方面能够有的放矢。军令部参谋视察对各部队参谋教育实施情况也有考核。1942年第三次参谋视察中,考察到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参谋教育方面缺点在于对于参谋教育缺乏应有的关注。^⑤第七十军参谋教育方面的优点是能注重干部教育,设有干训班,计划全军干部分三期完成,第一期已开始。缺点则为军幕僚班未能轮流调训参谋人员,也未能安排参加幕僚班的学员去前线见习。第一〇〇军的优点在于教育计划周详,对军士干部教育计划与实施均属良好。缺点体现在教育着眼未能注意研究敌阵地攻防惯用法以及防空战车之各种演习;参谋教育订有计划,未能实施。^⑥通过军令部参谋视察考核的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军令部初步形成参谋教育体系,然而总体上各部队自身实施的参谋教育却是“总部之参谋短期训练班,军部之幕僚班,多有未举办者,或已办而无教育计划者”,“师部对参谋机会教育多未实施”^⑦，“各部队对幕僚班之设置遵命办理者固属不少,其始终未举办者亦多。又幕僚班内所规定课程大多骛于繁杂,离开实际应用范围太远,经飭未举办者均应遵规定迅予办理,其课程并应力求由简如繁并顾及实际应用”。^⑧由此可见,部队自行召集训练参谋并未切实实行,效果也乏善可陈。

最后,军令部通过颁布相应人事法规,在毕业学员人事分配上采取一定措施,力求达到“人为我训、人为我用”的效果。抗战之前公布的《陆军大学校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学员毕业后,由校长呈请参谋本部择优任用,或送回原送机关服务”^⑨,原参谋本部并不能有效管理参谋教育机构毕

① 李振、何翔迥:《我们所知道的陆大特三期情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34页。

② 徐斯蔚、陈瑞安:《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79页。

③ 《在军委会国父纪念周工作报告》(1942年3月2日),陈存恭、赵正楷合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242页。

④ 《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第一组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8。

⑤ 《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各单位优劣对照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9。

⑥ 《军令部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参谋业务优劣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9。

⑦ 《军令部第三次视察参谋第一组总报告书》(1943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9。

⑧ 《历次参谋视察对参谋业务改进概要》(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721。

⑨ 《陆军大学校组织法》(1929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业人员。抗战爆发后《陆军大学校组织法》经过修正,第十五条规定:“学员修学期满,经毕业考试及格者……均呈由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分发任用”^①,通过这样的修正,从制度上保障了军令部对于参谋教育机构毕业人员的人事权。军令部统制参谋教育机构人员分发的成效体现在:“正则班第十六期,于毕业之前,有部分学员,由军令部管制,统一分派于中央各单位工作。如委员长侍从室、总长办公室、军委会办公厅、军令部(最多)、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铨叙厅以及各军种总部。旨在强化领导中枢,改进幕僚作业,加强单位间联系,发挥协调合作功能”。^②军令部档案记载,由于参谋教育人事分配方面采取相当措施,到1943年陆大、参补班以及情报参谋训练班总共分配2332名学员,其中陆军大学正则班和特别班毕业六期学员共847人,陆大参谋补习班毕业八期学员922人,谍报参谋训练班毕业三期学员共554人。这些学员均由军令部出面,按照各军事机构与部队实际需要分配到相应单位服务。^③1941年时“陆大毕业人员……实际上服参谋业务者仅约居四分之一,其余均担任队职”。^④到1944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62%。各级参谋教育机构毕业人员在各部队参谋,特别是高级参谋职务中服务的比例日益增高。第二次参谋视察第二组报告声称在其视察的西南各战区共有中将级别参谋3人,少将级17人,上校级17人,中少校级94人,上尉级65人,所辖集团军、军、师的参谋长、参谋处长和科长中有60%人员出自陆军大学。^⑤由此可见,战时军令部对参谋教育机构人事管理逐渐显示其效果,在中高级参谋以及参谋教育机构人员方面效果更为明显。

四、余论

抗战时期,军令部监督并领导各参谋教育机构,努力实现使“未受参谋教育之现任参谋人员必须受参谋补习教育,俾对幕僚业务增加磨炼机会”,以及达成“参谋人员须受统一的教育,养成统一的战术思想,战时始能上下贯彻发挥,统一指挥的效率”之目的。军令部在提高参谋教育质量,形成参谋分级培养特色,初步完善人才分配方面做出一定贡献。尽管军令部在参谋教育方面做出自身的成绩,但也不能不说,战时的参谋教育成效依然差强人意。

按照军令部当时总结,战时参谋教育大致有以下两点缺憾:“一、(所培养)大多数为高级军官,且均聚集于高级司令部中,在国民党军中所处地位,不免有头重脚轻之弊;二、在思想上学术上业务上,不能起一贯及相互为用之作用,因之其所领导之部队,各形成其‘自我’的‘特殊’的色彩与习性,亦难期有协同一致之步骤。”^⑥有学员认为参谋机构教学中由于“不能将德顾问的资料,结合本国国防实际情况,缩写成统帅纲领、作战纲要一类的条令,传给后辈,专研战场指挥,忽视参谋业务和后方勤务,以致作战时后方跟不上前方,参谋业务也欠灵活”。^⑦所以一些国民党军将领评价参谋教育结果时认为“国民党军中的参谋长,一般说来只是按照部队长的意志搞些司令部的业务……作用不大,只是摆摆样子而已”。^⑧徐永昌亦认为“军令部急需对战场有经验的军官,过去许

① 《陆军大学校组织法》(1945年4月修正),《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591页。

② 许承奎:《帷幄长才许朗轩》,第46页。

③ 《第三次部队参谋视察关于参谋人事之参考材料》(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1。

④ 《学术研究会第十次会议纪录》(1941年12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⑤ 《该部调查军师参谋长及陆大候选教育简历名册》(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70。

⑥ 《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20。

⑦ 章培:《陆军大学的教育情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83页。

⑧ 李振、何翔迎:《我们所知道的陆大特三期情况》,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第236页。

多没带兵,没作过战的军官都有缺点”。^①是故研究者评价“中国大陆的教育内容未能充分‘本土化’,过分偏重介绍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的实况”。^②

概言之,战时参谋教育存在的主要缺点就是头重脚轻,缺乏实践。就头重脚轻这方面而言,从陆大以及各级参谋班的毕业人数对比来看,的确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例如陆大参谋补习班西北班特三期86名学员(均为尉官)中,“分发第一志愿为军令部的14人,集团军司令部以上的44人,军部的20人,师部的8人”^③,合计去集团军以上者占毕业学员总数的比例高达67%,与参谋补习班创立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至于缺乏实践经验这方面,笔者认为有更深层次的因素。表面上看,这是中国参谋教育自身学科设置的问题,然而细察一下,其根本原因在于参谋系统在整个军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德国与日本参谋地位相对较高,其参谋人员在战时可以发挥相当作用,并能承担上一级或者两级部队的作战指挥,因此他们的参谋教育偏重于参谋业务以及作战指挥协调。例如参谋军官克纳佩(Siegfried Knappe)1944年被选中参加德国总参谋部的参谋在职培训,他回忆“总参谋部培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职学习,在此期间,学员会被逐步分派至师、军、集团军、集团军群中,通过直接观察来学习参谋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阶段是一系列短期的专业学校培训,例如装甲战、炮兵、工兵等等,为学员们提供各种类型军事活动的广泛知识,这是干好参谋工作所必须掌握的;第三阶段就是参谋学院,其目的是教会学员如何在战场上指挥一个师”。^④这种参谋教育可以让受培训人员熟悉军队指挥体系的方方面面,并能够真正适应战场实践。

反观国民党军,参谋人员在军事体系中是作为幕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军队主官助手,而不是如德国、日本那样的参谋系统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存在的,这就导致了国民党军在参谋教育中种种问题的存在。

由于军令部自身地位在整个指挥系统中不明确,因此参谋人员在整个指挥系统中地位相对不高,并不能发挥他们在德军日军中同行的作用。体现在参谋教育上,首先是无法顺利实施参谋教育。迟至1944年,居然还有阻挠军官参加参谋教育的情况。根据1944年11月21日《军令部第八十五次部务会报纪录》记载:“军校十七期毕业学生刘继汉分发一九〇师服务,经本部指名召集入西北参补班特五期受训。乃该生直属之三二六团团团长密不发表,迨令人第六期受训,该团长竟将该生禁闭一星期,仍不令受训。于是该员乃不假离职,径到西北参补班报到。而其所属师已转报局部准撤职通缉,现陆主任电部请示应如何办理案。决议:该生暂准随班上课,一面调查该战区其他师已否派送再夺。”^⑤一周后《军令部第八十七次部务会报纪录》显示“关于刘继汉入西北参六期受训一案,三厅已报。经查该战区其他师均已遵送奉谕对该学员仍准随班上课,并加考察。至一九〇师转报撤职通缉,可叙明原因,咨铨厅军政部备案”^⑥,军令部无法做到保障受训人员的合法权益,其无力感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为参谋教育目的不明确。一方面军令部想培养出能够胜任指挥以及参谋职位的人才,为最终建成参谋系统做贡献;另一方面,从实际培养成效角度而言,大部分受过专门参谋教育的学员最终却被看成是主官的幕僚与附庸,只能唯主官马首是瞻。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各级参谋教

①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盛文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10—11页。

②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台北,1993年9月,第17页。

③ 《陆大参补班学员分发志愿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600。

④ 西格弗里德·克纳佩、泰德·布鲁瑟著,小小冰人译:《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二战回忆录(1936—1949)》,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⑤ 《军令部第八十五次部务会报纪录》(1944年11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8。

⑥ 《军令部第八十七次部务会报纪录》(1944年11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48。

育比较注重参谋理论方面学习,实践教育明显不足。在教育期间,学习的参谋人员并没有深入一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是身处后方,自然有脱节之感。军令部高级官员在内部讨论会中就陆大教学指导思想曾有一番探讨。陆大教务处处长龚浩认为“陆军大学……尤以训练指挥官为最大之目的,不仅以参谋教育终焉,此为陆大应采取之方向者一;体用兼备之将才,一矫已往偏重军事科学艺术造就之弊失,此为陆大教育应采取之方向二;唯必须了解用兵方能了解,建军必有正确之军事思想,辅以丰富之服务经验,然后能养成知行合一之能才,达到平战两时之任务。固非以养成军事学者或幕僚人才一端而已。此为陆大教育应采取之方向三”。杜建时则认为“我国养成教育系两阶制,为军官学校及陆军大学,其他如参谋班、各专门学校皆为召集(补习)教育,改进陆大制度应顾及整个的军官教育体系。专就陆大教育制度而言,以现在一般情形,似不宜分段养成……”^①军令部主管大员们对陆军大学办学目的存在争论,焦点集中在陆大教育究竟是培养指挥官还是参谋,因此陆大教育自然就存在定位模糊的一面。军令部方面提出“现在国内不但缺乏参谋人才,实际上有相当修养之带兵官更感缺乏,造就将来人才固为根本之计,然以现时环境而论,实以对现有人员施以补习教育为重要”。^②军令部在教育目的上取折中主义,即认为陆大既要培养具有大军统帅能力的指挥官,又要培养具有现代军事学术水准的参谋,所以参谋教育方法上亦只能因循而已,难有根本性的改变。

军令部表面上似乎看重中、低级参谋教育,认为“1、现在学生程度较低,有参谋班一阶段较为确实;2、部队低级参谋缺乏,所办补习教育尚感不足,乃有特训班之召集,但人才虽好,经历过浅,而在班学期又短,亦以改为参谋班办法为善”。要求“参谋班为补习教育,以补充现有参谋之学识能力为目的……低级参谋亦应有大军统帅所需学识;陆大毕业学员对大军协同作战多感基础学术不足”。^③实际上,军令部第三厅副厅长陆权曾经指出:“参谋教育从前陆大系三年招一期,自迁南京后改为每年招一期,然仍感幕僚容易之不足。复自参谋补习班之设,抗战开始后参谋员额大增。为应国民党军急需,遂将陆大不必要课程减去,并缩短修业年限。如此虽于数量有所增加,然于素质不免低降。”^④

抗战时期,军令部形成不同层次的参谋教育,尽管已有体系框架存在,但是参谋教育成效上依然存在相对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从根本上说,因为指挥系统理不顺,军令系统地位就不明确,参谋教育实施的目的也就无法厘清,所以不能真正解决参谋教育遇到的种种问题。于是,在抗战这一大背景下,国民政府建军不成,指挥系统叠床架屋,令出多门,军令部无法真正发挥参谋系统应有的作用,很多举措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中的困境,也正是战时国民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面临困境的缩影。

〔作者叶铭,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学术研究会第十三次会议纪录》(194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② 《学术研究会第十三次会议纪录》(194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③ 《学术研究会第十四次会议纪录》(1942年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

④ 《学术研究会第十次会议纪录》(1941年12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51。